

略论女性文化对宋词雅化的影响

曹颂今

(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 河南 洛阳 471023)

【内容摘要】文章主要论述了北宋时期社会主流文化对词的创作的影响。宋代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,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市民阶层的兴起,对包括词在内的文学形式的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。而其中体现的享乐主义的女性文化,成为了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形式。宋词在走向形式的完美的过程中,女性文化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【关键词】宋词 艳科 雅化 女性文化

中图分类号 I206.2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0)06-0101-03

宋代是词的创作盛期,两宋时期的词的数量和质量,空前绝后。北宋时期是不容置疑的词的高峰期。但在这一时期,词在发展方向上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一方面,温庭筠、冯延巳以及李煜的词,的贵族文学传统已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。另一方面,市民阶层的兴起,却又使词必须向生活化和市井文学靠近。女性内容,包括对女性形象的描摹、对女性心理刻画在词中的大量显现,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宋代文人,在饱受诗书之累和经世治国的碌碌之行后,在个人情欲和操守之间找到了一个中和的连接。“艳科”、“小道余技”的观念在宋初很长的一段时间,成为词社会价值的标签。

一、北宋词坛的雅俗对立与融汇

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评判,“雅”的内容的确超越了美学视野。从道德层面看,“雅”具有儒学精神的端庄。《毛诗序》云:“雅者,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”从文学的角度看,“雅”又具备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特征。可以说,“雅”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哲学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综合体现。雅文学的含义,不仅显示出较高的审美品位,也决定了文学形式的非大众化。北宋初期的词坛,上承五代词感伤忧郁的词风,下受骅体文和西昆体诗的影响,其创作视野始终不能离开罗绮锦绣和玉砌雕栏,从本质上还是贵族文学。这使得词在北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“雅文学”的基本格调。文人对诗的评价是以雅为美的。“诗,雅道也。择其言尤雅者为可耳,而一切涉纤、涉巧、涉俚、涉俗、涉佻、涉诡、

涉淫、涉靡者,或之如避鸩毒可耳”(《师支诗界录》)^{[1](P170)}。同时,他们又认为词的发展必须向诗回归。如晏几道就自序其词为“补乐府之亡”。胡寅《酒边集序》亦云:“词曲者,古乐府之末造也”。按照这种观念,词的走向应该向雅的方面发展。

但是,关于词的“雅”的道德评判方面,北宋初期的词人的态度却是暧昧的。他们不承认词具有言志的功能,转而以轻薄的态度对待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(卷二)载:“钱惟演云:‘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厕则阅小词’”。作为西昆体代表人物,钱氏对词的鄙薄可为士大夫的代表。那么,词为什么不能得到与诗相同的对待呢?最大的原因在于其创作环境的世俗化。由于市民文化的催生和传播途径的娱乐性,词的社会功能被局限于自娱娱乐,甚至于传播风情,这无疑是有悖于儒学精神的。清代王又华《古今词论》:“即词号称诗余,然而诗人不为也。何者?其婉变而近情也,足以移情而夺嗜。其柔靡而近俗也……”^{[2](P595)}。这样的评价,无疑是否定了词的正统意义。艺术上的求雅与价值观上的否定,使文人在词的创作心态具有双重性。他们在词的遣词造句上精益求精,却在风格上迁就时尚;在意境创造力求完美,却不敢肯定作品的艺术价值。据宋人张舜民《画缡录·卷一》载:

柳三变既以词忤逆仁庙,吏部不放改官。三变不能堪,诣政府,晏公曰:“贤俊作曲子么?”三变曰:“只如相公亦作曲子。”公曰:“殊虽作曲子,不曾道‘彩线慵拈伴伊坐’。”柳遂退。

* 作者简介:曹颂今(1964-)男,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。

这一段柳永与晏殊的对话,体现了文人在词的价值体现上的一致性。柳永(三变)因词触怒皇帝,不能做官。去找晏殊理论,被对方以他的词低俗和女性化为理由斥回。柳永对这个理由也再无争辩,等于默认了晏殊对其词作的评价。

从雅俗对立的角度看,雅词的创作因含蓄典雅和情感细腻而受人追捧,流传后世,而所谓的俗词,因其感情表达的世俗化和语言的大众化,艺术品位上不能与雅词共存。但不论雅词还是俗词在创作上却有了一个清晰的交点,就是对女性题材的共同钟爱。俞文豹《吹剑录外集》载:“欧阳文忠、范文正矫矫风节,而欧公词云:‘寸寸柔肠,盈盈粉泪。楼高莫近危栏倚’。又‘薄倖辜人终不愤,何时枕上分明间。’范文正词‘都来此事,眉间心上,无计相回避。’又‘明月楼高休独倚,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。’……情之所钟,虽贤者不能免。”^{[3](P254)}在以上这些作品中,既可以看到雅词,也不乏俗句,但都是写情事。可见文人追逐时尚,即使是如欧阳修、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也未能免俗。明代的杨慎在评判范仲淹的闺情词时说:“大抵人自情中生,焉能无情?但不甚而已”(《词品·卷三》)。一语道出了宋人对女性内容的言情词的态度。宋词“十九不离男女情事”,让以女性文化为主流的生活体验主宰词作,使词在雅化的同时,出现了大量情色风月内容的艳曲。

二、女性文化介入词作的社会条件

北宋时期女性文化的泛滥,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倾斜和主流文化的世俗化有着极大关系。由于延续了五代官制的种种沉疴,造成了积弱、冗官、兵羸等不求进取的局面。商业的发达、城市生活的多样化以及市民文化成熟,又使社会观念日益偏向享乐主义。庞大的社会精英集团,被包围在市民生活繁华而狭小的生活圈子里,浑浑噩噩,不思进取,只以檀唇香袖间获取声色的满足。女性内容不可避免地成为创作的焦点。与诗相比,词的形式更适合娱乐性的演唱。“吴娃劝饮韩娥唱,竞艳容,左右皆春。”(张先《泛清苕》)^{[4](P82)}这种观念,不独以专写艳词的柳永等人所有,而是宋代文人的集体意识。于是,青楼云集的汴京就成为“艳词”的集散地。花间词创作以“艳”为美、以“柔”为美的审美特质,在宋代词家的手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。市民文学对女性题材的开拓,也使宋词轻易地跨越了儒学对女性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”的审慎态度,极大地拓宽了词的接受基础。

女性内容在宋词中的显现,不是女性简单被动地被写入词中。而是女性根本就是造就词的社

会效果的主角。词是由文人创作的,但却是歌妓的演唱流传的,真正的社会效应取决于这些混迹于城市各种风尘场所的年轻女性。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,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”(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梦华录序》)。无论是市井歌肆的调笑曲子,还是文人的“闺情词”都离不开歌妓的喉舌。实际是女性文化对词的又一次加工,对产生于殿堂书斋中的雅词的传播尤为重要。据陈郁《藏一活腴》:晏殊“每作词调,必先使宠人歌之”。达官贵人把女性的柔美与词的婉约结合,作为生活中最大的享乐,得词随着女性的演唱传播。“娉婷秀媚,桃脸樱唇。玉指纤纤,秋波滴溜,歌喉婉转。道得字正韵正,令人侧耳听之不厌”。^{[5](P178)}歌妓不仅使词以音乐的形式显现,其自身的女性特征也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,成为社会时尚和情色文化的主角。

从表面上看,歌妓的角色对词的作用只限于传播,但这种享乐文化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动摇和精神的麻痹,造成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词的审美意义。使词成为北宋王朝“积弱百年”的思想弊端之一。据陈师道《后山词话》记载,北宋仁宗皇帝颇好柳词,“每对酒,必使侍从歌之再三”^{[6](P311)}。而北宋最后一位宰相何栗,在靖康元年金兵围攻汴京,社稷朝不保夕的情形下,“日于都堂饮醇酒,谈笑自若。时一复讴柳词”^{[7](P516)}。当歌喉婉转的曲子词和长袖飘舞的美妙姿态耳闻为声、目视成色的时候,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也随波逐流。和“花间词”不同的是,宋词女性化并非处于个人的文学价值取向,而是强大的世俗力量推动的结果。政治军事上的懦弱溃败导致了柔弱敏感的心理,城市经济的繁荣促成了享乐心理和恋情心理。种种心理延伸到文学领域和审美领域中就制造出了香艳柔婉的宋词。宋代文人以女性内容入词,并不代表他们都是登徒子,许多人是借助女性的文化符号表达内心的压抑。“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”表明他们至少在词这一种文学形式上向社会的妥协。

三、女性文化在词的雅化过程中的作用

“雅”是士大夫文化的传统,从魏晋时期开始,文人就刻意经营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。陶渊明、谢灵运等人的诗作可作为雅诗的代表,他们的作品尽管风格迥异,但在脱俗的方面是一致的。宋词受“花间”和李煜词影响,本身并没有刻意追求清新自然的格调和追求脱离世俗的和谐,而是在尘世上找到了婉约的另一面。在商业化、城市化的环境中,俗文化的积累不可避免地使宋词的雅化受到影响。在这种前提下,大量女性内容的词的出现对词的品格走向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宋代以

理学精神为核心,在“政教文化”的压抑下,写女性生活、于女性环绕的环境中进行创作,无疑成为人性的释放的原动力,并由此形成真、深、艳、婉、美的词境。“夜上青楼去,如迷洞府深。妓歌千调曲,客来五方音。藕白玲珑玉,模黄磊落金。酣歌自萧散,无复月中吟”。(刘过《酒楼》)^{[8](P59)}词人以“小道余技”这样的借口,绕过了礼教和儒家诗论的设防,转到言情诉怨的轨道上来,使词是语言的表达和感情的倾诉上超越了现实。这种转变尽管不能完全摆脱俗文化的影响,但深切、真性和女性形象所特有的柔、媚等世俗标签,固化了词的审美格调,使词走上了另一条雅化之路。“艺术化的柔弱心灵,精巧雅致的审美情趣,被压抑的屈辱与愤怒,是宋人的主要心理特征。”^{[9](P29)}正是这种创作心理,推动了词的雅化进程。

北宋词中,对女性的观察和描摹的细致程度,完全超越任何一种文学形式。女性的形体服饰、闺阁情思在词中泛滥成灾,以至于“艳情”、“艳事”成为词中津津乐道内容,成为创作的主流。如欧阳修《好女儿令》:“眼细眉长,官样梳妆,鞦鞋儿走向花下立著。一身绣出,两同心字,浅浅金黄。早是肌肤轻渺,抱著了,暖仍香。姿姿媚媚端正好,怎教人别后,从头仔细,断得思量。”^{[5](P732)}这样的词,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得上与雅有关,但因反映的是女性内容,一时广为流传。后人评价东坡豪放词“虽极天下之工,要非本色”^{[6](P309)}。只有“长短句使雪儿、麝春莺辈可歌,方是本色”(刘克庄《翁应星乐府序》、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》《四部丛刊》本)。这种将个人的欲望和私情公开化的表白,显然与儒学精神格格不入,但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以道德文章闻名的晏、欧等人的词中,女性文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只要涉及女性内容,北宋词人的雅俗的标准总显得含糊,如柳永词,既有“骀荡从俗,天下诵之”的情乐之词,也有“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(《雨霖铃》)的雅词。由于世俗社会中情色内容的不断诱惑,他们对词的创作是双重标准的:如要迎合娱乐和流行的需求,女性内容叙写则大多被庸俗化,而自诉内心的感情体验,则写的含蓄雅致。士大夫们一边崇尚意趣高深的雅词,另一方面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,将男女之情在词中叙写的明白如话:“此身甘向情中老”(欧阳修《踏莎行》)、“人生有限情无限”(晏殊《踏莎行》)。这种矛盾的心态正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儒学精神的缺失。

归纳起来说,女性文化对北宋词的雅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,女性文化的观照对

词的繁荣的作用不容忽视。尤其是北宋前期的词作,离开了女性题材和男女情爱的内容,词坛几乎一片空白。而词正是在雅俗融汇中产生的高层次的作品。宋词的典雅精巧,恰恰是产生于俗文化的“俗词”给予了走向雅化所具备的漫长历程,使它具备了向雅文学冲刺的足够的距离,而女性文化则是孕育了雅化种子的土壤。第二,在宋词的雅化渐进的道路上,女性内容对词的雅俗发展起到了包容的作用。宋代是儒、道、佛并存的时代,大多数文人头脑里并非完全的孔孟之道。他们对以“情”为主的词的标准认识也是多元的。当享乐思想和欲望占上风的时候,就会出现以情色为主调的艳词、俗词;当用词表达深沉的内容时,雅词就产生。于是便有欧阳修“离愁渐远渐无穷,迢迢不断如春水”(《踏莎行》)的凄婉。柳永“渐霜风凄紧、关河冷落、残照当楼”(《八声甘州》)的悲情,秦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(《鹊桥仙》)的含蓄。这些词传诵既反映了宋人创作上最高的审美追求,也是词过滤了“俗”的成分后,艺术魅力的最终显现。女性文学在雅俗之间所产生的张力,足以使词突破世俗,向更高的艺术层次迈进。

结束语

如同诗最终走向形式化一样,雅化是词的发展的艺术走向之一。受宋代特有的社会条件的影响,难免受到女性文化的羁縻。宋词在商业文化氛围中的雅化过程,充满了婉约与情愫。这种格调是宋代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和情感需求的产物,与社会对词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。当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,以文为词后,他的豪放词风就为词坛的注入了清新之气,大大冲淡了狭窄的女性题材导致的词的雅化的片面化。南宋时辛弃疾、张孝祥等人在社稷危亡时的爱国词章则完全摆脱了雅俗的束缚,使词的发展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新的境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孙克强.雅俗之辨[M].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7.
- [2] [清]王又华.古今词论.词话丛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3] [宋]俞文豹.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吹剑录外集[A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
- [4] [宋]吴自牧.梦粱录·卷二十[M].北京:中国商业出版社,1982.
- [5] 唐圭璋编.全宋词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6] [清]历代诗话·上.何文焕辑[A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7] [宋]徐梦莘.三朝北盟会编·卷六十八[A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8] [宋]刘过.龙洲集·卷七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- [9] 朱崇才.词话学[M].台北:台湾文津出版社,1995.